

社会科学



研究中的叙事

Narrativ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丛书主编 ◎ 丁 钢

对于质的研究者而言，叙事分析比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因为这一方法更适合常规研究。本书从历史素描开始，简要地勾勒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历史关系，深入阐述了叙事方法如何运用于实地工作，并探讨了社会科学写作与其他文本写作的相似性。

【瑞典】芭芭拉·查尔尼娅维斯卡·著
(Barbara Czarniawska)

鞠玉翠·等译

丁 钢·审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3
19

C3
19

社会科学

研究中的叙事

Narrativ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瑞典】芭芭拉·查尔尼娅维斯卡 · 著
(Barbara Czarniawska)

鞠玉翠 · 等译

丁 钢 · 审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权声明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Los Angele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Barbara Czamiawska,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叙事 / (瑞典) 查尔尼娅维斯卡著; 鞠玉翠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303-10777-3

I. ①社… II. ①查… ②鞠…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IV. ①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4545 号
北京市版权局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07-4269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2.25

字数: 159 千字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策划编辑: 郭兴举 责任编辑: 路娜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序

日益发展的教育叙事研究已经呈现出其本身的理论取向，尽管教育叙事研究同样需要丰富、深刻的理论知识基础，但其研究的主张不是运用现成或某种理论对于实践的演绎求证过程，而是强调，任何新的理论及其观点的出现是在对实践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而发生、发展的过程。

一方面，进行教育叙事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实践经验之外。以前，人们以为只有站在事件的外面，才能看清整个事件。其实这在质的研究中是很难理解的，如果你置身于事件之外，又怎能看清整个事件呢？有质疑者认为，如果你站在事件之中，容易被事件的情感、其他各个方面影响和干扰。但反之，如果我们的情感和思想不能够现场交流的话，就根本无法得到事件的真相。所以，我们只有站在事件之中，并与之交流对话，我们才能揭示这个事件，尤其是人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叙事研究与其他，如思辨式研究的不同之处。但我并不主张这两种研究完全的对立。真正好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两种研究中的交互分析。例如一个人物的访谈内容，能全相信吗？如果要发挥它更大的价值，肯定要对访谈的内容做进一步的客观事实的印证。当对这个客观事实进行印证时，就需要交互分析。

另一方面，置身实践经验之中，我们容易受到以往理论知识背景的左右。如果我们不能“悬置”前见（包括理论和实践），就会妨碍我们对实践多样性的理解，这就需要解构分析方法来判断叙事所包含的可能意义。所谓“解构”分析的策略，其实是反向的。如果我把这个结构破掉，它的关联也破掉，来审视它是否可行？如果不行，再来看

它的结构的问题。作为一个验证的手段，解构非常重要。一个不会解构的人，你很难想象他会建构。一个观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通过文献，包括经验的综述和研究，对类似问题的研究，才能梳理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只有通过这样的梳理，才能感觉到可能哪个问题值得重视，然后才能谈研究问题的价值何在？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可能的理论在哪里？我们经常说，“方法是理论的灵魂”。的确如此，事实上我们就是不断从各种途径、方法去逼近真理性的理论认识。从这点来说，正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如何解构也成为非常重要的方法。然而，解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要将以往的知识加以解构，不仅需要强大的批判能力，而且需要对于实践经验的理论理解力和穿透力。我以为，如果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有点反向的考虑，更便于解构以后的建构。因为，理论必须有建构的意识，或者说，从实践出发，用解构的心态去建构，新的理论及观点才会向你招手。

由此，教育叙事研究必须深入到教育生活中，从鲜活的教育生活经验中获取素材。所有的第一手素材都是自己去发现的，因为只有在一手的素材中，才能生成自己的想法，生成新的理论取向。换言之，即使理论上可以参考别人，但是真正属于自身的研究观点是在对实践的了解过程中逐渐生成出来的。

可以说，教育叙事研究并非不需要理论或忽视理论，而是不要有理论预设。为什么不要有理论预设，因为理论预设的前提如同前见可能会影响你对活生生的实践的再认识，而通过教育叙事的研究，也让我们可以改变教育研究的思维途径和方式。

当前教育叙事研究已经成为一股热潮。我们编辑这套以国内外学者著作相结合的丛书，其目的正在于期许这种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交叉视角能够进一步拓展我们对教育叙事研究的认识，以参与他人的研究经历而促进自身的理解。



识于华东师范大学

2010年2月

前言

质的研究始于“自然主义”流派（参见 Gubrium and Holstein, 1997）。20 世纪 30 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记录“未开化”世界的生活和经验。“自然主义”对日常生活不同方面和不同形式进行了丰富而引人注目的描述。然而，在 20 世纪后半期，许多质的研究者开始对这一流派产生怀疑。

一些人认为，自然主义者没能充分识别这个世界的性别化以及社会和人种分层特征——对自己的写作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Denzin and Lincoln, 2000）另一些人则认为，对“日常生活”规律性的观察能力，依赖于需要分析的、复杂的、以语言为中介的交互作用体系。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DA）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并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性资料，丰富地展示了在真实时空中参与者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参见 Silverman, 2001）

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NA）与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一同分享了这一语言学转向。显而易见，对质的研究者而言，叙事分析比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因为它更适合常规研究。例如，会话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增加）和话语分析更偏爱“自然产生的”数据，而叙事研究者则常常运用开放式访谈。这样，他们通过访谈为从事主流研究的同事们提供了有益的阅读资料——目前这仍是最受欢迎的质的研究数据。

芭芭拉·查尔尼娅维斯卡是迄今最著名的叙事研究者。

(参见 Czarniawska, 1997; 1998; 1999a; 2003b) 事实上, 她的工作围绕着二十一世纪初质的研究者关心的许多主题: 语言学转向、对性别和权力关系的认知以及如何表述自己研究的后现代关注。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叙事》由于芭芭拉对该主题长期的关注而进一步丰富, 她先前出版的相关著作, 以及她在许多国家教授的研究生课程都为本书提供了养分。本书主要面向那些对叙事方法的运用感兴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毕业班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愿意探索新视角的研究者。本书可用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科学、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研究; 既可用作叙事方法课的主要教材, 也可用作一般方法论课程的补充教材。

本书从历史素描开始, 简要地勾勒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历史关系, 以及最近在叙事中表现出来的二者之间的友好关系。结尾则列举了运用叙事方法的理由。本书主体部分的结构有助于按照研究步骤的顺序进行学习。说明了叙事方法如何运用于实地工作(如何创作、搜集、引发故事), 如何阅读这些搜集到的或编织出来的叙事(解释、结构分析、深入阅读), 最后探讨了社会科学写作与其他文本写作的相似性。基本上每个章节都有一个或多个练习和拓展阅读书目。特别有助益的一点是, 本书各章的实例来自许多不同的社会科学分支和作者自己实地进行的研究。

我确信本书将会给学生和研究者提供巨大的帮助。

戴维·西尔弗曼 (David Silverman)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社会研究中的“叙事转向” 1

历史回顾..... 1

把行动化叙事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

形式..... 4

作为认识方式的叙事 9

作为交往方式的叙事 13

后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叙事空间

..... 15

本书简介 18

第二章 如何创作故事 21

把叙事编入故事 21

情节编织的方法 25

边观察边创作故事 29

第三章 故事搜集 41

口述史 41

故事的搜集 46

故事的讲述 48

组织和组织中的故事 51

故事搜集的方法 55

第四章 访谈情境中的叙事 60

什么是访谈	60
作为互动和叙事发生场所的访谈 ...	63
访谈情境中引发叙事的难点	65
避开叙述	68
作为叙事的访谈记录文本	70

第五章 阅读叙事 77

赫尔纳迪的三分法	77
说明的困难性	78
解释的类型	81
探 索	91
阅读埃根·彼特纳	93

第六章 结构分析 97

民间故事的形态	97
演化故事的形态	100
行动者模型	102
脚本和图式	105
其他类型的结构分析	107

第七章 深入阅读：后结构主义、

打断、解构 112

行动中的后结构主义	113
打 断	116
解 构	122
变革的世界	125

第八章 阅读社会科学	130
关于醉酒司机研究的戏剧分析	130
作为作者的人类学者	133
经济学中的故事讲述	137
作为引诱的领导：解构社会 科学理论	143
来自个人实践的叙事	147
第九章 社会科学的写作	149
模拟，或如何表述世界	149
情节，或如何理论化	157
第十章 叙述社会科学	167
来自现场的危险故事	167
现场令人烦恼的故事	169
有希望的叙事	172
术语表	176
译后记	182

第一章 社会研究中的“叙事转向”

历史回顾

把行动化叙事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

作为认识方式的叙事

作为交往方式的叙事

后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叙事空间

本书简介

历史回顾

关于叙事在社会生活中重要作用的阐述，引用率最高的是法国符号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一段话：

世界中的叙事数不胜数无穷无尽。叙事首先表现为差异悬殊的各种类型，这些类型分布于不同的载体中——就好像任何材料都适合表达人类的故事一样。叙事能够通过清晰的书面或口头语言、固定或移动的图像、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方式

的有序组合来表达；叙事存在于神话、传说、寓言、童话、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戏剧、喜剧、哑剧、绘画……彩色玻璃窗、电影、漫画、新闻、会话，等等，各种不同的形式之中。而且，在这些无穷的形式中，叙事几乎出现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所有社会；它起始于人类历史的开端，从没有人能离开叙事。各个阶层、各个人类群体都有他们各自的叙事……如果抛开叙事的好坏，那么叙事则是跨国界的、跨历史的、跨文化的：它时刻在那里，正如生活本身。（Barthes, 1977: 79）

的确，叙事是跨国界、跨历史、跨文化的，人们对叙事的兴趣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叙事分析起源于对《圣经》《犹太法典》和《古兰经》的解释性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叙事分析开始于俄国形式主义者（formalist）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他于 1928 年出版了《民间故事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Folktale*）一书，谨慎细致地分析了他眼中的俄国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普洛普及其后像米克黑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这样的后形式主义者继续发展了叙事分析。然而，叙事分析第一次得到广泛认识是在 1958 年，那一年普洛普的书被翻译成了法语和英语。到 1968 年，该书的英文版再版时，在文艺理论界内外都受到了巨大关注。

唐纳德·波尔金霍恩（Donald E. Polkinghorne, 1987）宣称，当代叙事文学研究源于四个国家的传统：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判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德国解释学。如果进一步向前探寻，许多语言和叙事分析可以追溯到两位比较语言学家：波兰的简·尼斯罗·博杜安·德·库尔特奈（Jan Niecislaw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和瑞士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① 苏维埃革命之后，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①关于他们工作的简短描述，参见新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缩微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0: Micropedia, Vol. 1: 969; Vol. 10: 427）。

Todorov) 和符号学家阿尔吉尔达斯·格雷马斯 (Algirdas Greimas) 等移民, 在法国发展了东欧的传统, 而巴赫金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前苏联继续他们的工作。

上述所有这些运动的共同点, 仅在于他们对文本的兴趣而不是作者的意图或文本产生的环境, 这是与传统解释学相对立的。以诺思罗普·弗赖伊 (Northrop Frye) 和罗伯特·斯科尔斯 (Robert Scholes) 为代表的新批判主义的主要观点是, 他们不仅寻求普遍的情节结构, 而且也寻求叙事历史的演进过程。像托多罗夫和罗兰·巴特这样的法国叙事学家, 更多地受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 的影响, 而列维-斯特劳斯早年读过普洛普的书。列维-斯特劳斯与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 (Naom Chomsky), 一生都致力于寻求不变的、一般的人类心智结构。另一位传统解释学的批判者 (也是发展者) 来自德国。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以大力推动了当代解释学而闻名。沃尔夫冈·伊泽尔 (Wolfgang Iser) 和汉斯·罗伯特·姚斯 (Hans Robert Jauss) 则走得更远, 他们甚至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接受理论 (reception); 伊泽尔特别强调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1978)。在所有这些过去和现在的学者中, 保罗·里克尔 (Paul Ricoeur, 又译利科, 1984; 1986) 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他的成就是把各种流派按照他的兴趣整合起来。他的兴趣是: 即时性 (temporality) 与叙事的关系。

对叙事的这种兴趣超越了文艺理论的界线, 渗透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家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观点: 历史可以没有规律, 只有历史编纂, 历史学家把事件编入历史而不是“发现”它们 (White, 1973)。威廉·拉波夫 (William Labov) 和乔舒亚·瓦列斯基 (Joshua Waletzky) 赞同并改进了普洛普的形式分析, 提出社会语言学应该关注自身, 关注对简单叙事进行结构分析, 是最终理解复杂叙事结构和功能的关键 (Labov and Waletzky 1967, 12~13)。理查德·哈维·布朗 (Richard Harvey Brown) 从事着类似的工作, 提出了“诗学社会学” (a poetics for sociology, 1977) 的主张, 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巴赫金在他之前

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Bakhtin, 1928/1985)。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涓涓细流已汇成大河。沃尔特·费希尔 (Walter R. Fisher, 1984) 指出了叙事在政治学和叙事分析在政治科学中的中心地位;在心理学领域,布鲁纳和波尔金霍恩 (Jerome Bruner, 1986, Donald E. Polkinghorne, 1987) 同样强调叙事的重要性;社会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劳雷尔·理查森 (Laurel Richardson, 1990);在经济领域,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Deirdre McCloskey, 1990) 研究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叙事。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叙事分析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中一种普遍的方法 (参见, Curtis, 1994; Silvers, 1995)。

把行动化叙事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

人文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都非常推崇叙事取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把行动化叙事作为最典型的社会生活形式是非常有益的 (MacIntyre, 1981/1990: 129)。这种观点不必是认识论的视角;而生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行动化的叙事,但是这样去构想生活会提供丰富的见识。这种观点至少起源于莎士比亚时代,后被肯尼斯·伯克 (Kenneth Buike, 1945)、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1980)、维克多·特纳 (Victor Turner, 1982)、伊安·曼海姆 (Ian Mangham) 和迈克尔·奥韦林顿 (Michael Overington, 1987) 和其他许多人吸收和改造。

让我从阿拉斯泰尔·麦金太尔 (Alaskair MacIntyre) 哲学的基本原则出发:社会生活就是叙事。社会生活通常由行动和事件组成,二者的不同通常在于行动的意向性。然而,在许多社会科学文本中,“行动”(action)这一术语往往被“行为”(behavior)所替代。按笔者的观点,“组织行为”是个想当然的术语——即使对其他挑剔的作者和读者来说也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究竟有没有必要争论“行动”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呢?有必要,因为如果我们追溯“行为科学”的概念,会追到 18 世纪的经验论,在那里,“感觉材料”(sense-datum)被认为是认识的主要单元和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我们仅仅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感性描述,“我们就会遭遇一个不

可解释而且是无法解释的世界”(MacIntyer, 1981/1990: 79)。而这样的—个“行为”世界,是无意义的、机械的,因为如果感觉材料成为法律条文的依据,那么所有关于意向、目的、理由——这些把行为变成人类行动的要素——都会被排除在外。^①

麦金太尔及其他叙事的倡导者把行动的概念限定到人类:“人类能够描述解释自身的行动;其他生物则不能”。(MacIntyer, 1981/1990: 209)在第六章我阐述了这种限定并不必要的观点,但是目前,让我们仍然遵从这些倡导者的上述限定,即通过叙事概念来把握人类举止(conduct)。阿尔弗雷兹·许茨(Alfred Schutz, 又译舒茨, 1899—1959)指出,如果忽略了意向性就不可能理解人类举止,如果忽略了他们建构意义的场景也无法理解人类的意图(Schutz, 1973)。这些场景可能是制度、实践场所或其他人类创造的情境——在这些历史的情境中,特定行为和整个个体行动者的全部历史能够且必须置于其中才可能被理解。

行动的概念(Harre, 1982)可以被视为在特定的社会秩序中行动者之间发生的有意图的举动(act),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界定与三种思想传统相关联。一是里克尔(1981)所代表的文学解释学,他建议将有意义的行动看做是文本,反之亦然。有意义的行动具有文本的基本构成性特征;行动被符号客观化,从而使得行动摆脱了行动者;超越即时的情境;可以像“公开的作品”一样被阅读。因此,文学解释理论可以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

第二个重要的传统是现象学,由许茨和他的学生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勒克曼(Peter Berger, Thomas Luckmann)将其介绍到社会科学领域。现象学遭遇美国实用主义,产生了两个与当前情境相关的分支。一个是以赫伯特·布鲁默和霍华德·贝克(Herbert Blumer, Howard S. Becker)为代

^①这种技艺从不会完结,但是可以严肃追求。最好的充满模糊性的例子是著名的——也是声名狼藉的——心理学中的概念“态度”,这一概念坚持保留意向性,承诺了太多但是给予的太少。

表的符号互动论；另一个是由哈罗德·加芬克尔、亚伦·西科雷尔和哈维·萨克斯（Harold Garfinkel, Aaron Cicourel & Harvey Sacks）发展起来的民族方法学。他们的灵感被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西尔弗曼（David Silverman）成功地汲取（参见 Silverman, 1975；Silverman and Jones, 1976；Silverman and Torode, 1980）。

民族方法学在这里很重要，因为它引入了理解社会行动的核心概念——可述性（accountability）。可述性是人类交往的主要纽带；事实上，也是主要的社会纽带。举止只有在能够用特定社会场景中可接受的术语来描述的情况下才能称为行动（在一个举动之前、同时或之后，Harre, 1992）。人们需要花时间计划、评论、判断自己和他人做出的举止。尽管有一些可能仅发生在人们头脑中想象的会话里，但大多却发生在“真实”的与他人的会话中。

传统民族方法学的局限在于很难解释不同描述规则间的联系，这些差异似乎源于情境的不同。“恋人间的会话”与“少年跟愤怒的母亲之间的会话”非常不同，但是同一时期发生在同样地点的恋人间的会话和少年与愤怒的母亲间的会话彼此却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如何可能？拉图尔（Latour, 1993b）认为，民族方法学可以解释社会性，但无法解释社会：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固定人的各种行动，并使情境具有可重复性。对他而言，技术是非常固定的、起到连接作用的工具。在上述例子中，电影和电视向恋人和少年们传播了大量的会话脚本。更一般地说，是复制技术复活了历史，使得当下的会话在历史中——即过去的会话中找到定位。

正如文学评论中，根据会话如何被重复、如何变化，能够把会话分成不同类型。在当代，最核心的类型便是生活故事：传记或自传。尽管伊丽莎白·布拉斯（Elesabeth Bruss, 1976）所称的“自传行动”（autobiographical acts）早在十七八世纪就已存在，但是当时仍被看做是私人文件。1680年以后，“传记”成为被世人广泛关注的术语，但是术语“自传”出现在英文文本中却是在1809年（Bruss, 1976）。因此关注叙事以期理解其他现代类型提供线索是合理的。叙事的共同特征是把个体历史的叙事放在社会

历史的叙事中（家庭或国家），甚至放在叙事的历史中。

个体历史叙事的重要性与下面事实相关：人们为了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生活转化成叙事形式——当他们试图理解他人生活的时候，同样如此。因此行动通过在生活叙事中找到一个位置来获得意义。正如在许多语言中都提到的一样，“生活就像写一本书”。

这听起来好像说人们只要愿意就会讲故事，而且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塑造他们的生活。这事实上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典型的批评：这种观点把世界当做一本主观编织的故事集^①。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是我们自己故事的唯一的作者；在每个会话中都有定位关系（Davies and Harre, 1991），这种定位关系被会话中的伙伴接受、拒绝或改进。当一个新的部门主任向同事介绍自己时，她告诉他们自己希望被看成什么样。而同事们的反应则会告诉她，她所说的有多少被接受或拒绝，有哪些话已经被同事们修改，部门成员希望自己给新老板留下什么印象等。但是，到介绍会结束的时候，状况已不同于开始的时候；而且只要这些人还在一起工作这种改变就会继续，甚至在后来所讲述的历史中还会改变。

另外，没有参与会话的其他人或机构也会对叙事产生影响；这主要关涉到权力。一些人决定另一些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身份，等等。但即使是权力游戏中的木偶，也是历史的合著者——在其他行动化叙事中担任角色。

个体叙事如何与社会叙事联系起来？为了理解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很重要的是发现它的合理故事集及其发展——这就是我在前文所说的叙事历史。因此，正像麦金太尔提醒读者的，在前现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是用适合当时社会类型的方式讲述故事。在社会化过程中，或者像人类学家所说的教化（文化适应 enculturation）过程中，年长者帮助年轻人把自己与他们所属社会的叙事相联系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在崇尚英雄的社会，

^①关于批评和捍卫社会建构的评论，见查尔尼娅维斯卡（Czarniawska, 2003a）。